文学新观察

知青文学，还有无超越的可能？

宋　庄

早上，我健步上楼，轻敲女儿卧室的门，获得同意后，进入，要抱起刚刚醒来的外孙女。3个月大的宁馨儿的头侧向一边，听到声响，缓缓转过来，对着一张俯下去的老脸，笑了，第一朵笑！眼珠晶亮剔透，这就是——两个“太阳”照临我不复轻盈与鲜妍的黎明。

我抱着婴儿，走到客厅的大窗前。窗户朝西，望得到大海，它布满鱼鳞片一般的细浪。又是阴天，薄薄的雾气像稀释的鲜牛奶。屋子前面的人行道响起人语，年轻的母亲带着孩子经过。孩子1岁多，充满好奇心的年龄，在我家贴邻的草地旁，被一棵雪白的蒲公英吸引住，蹲下去，和花儿说话。母亲耐心地站在旁边。这位看模样不到30岁的白种女士，有一头金黄的长发，手拿着穿红裙子的洋娃娃，肩上还挎着大书包。她一任女儿东跑跑，西看看，只温柔地看着，跟着。母女不时交谈，可惜距离远，听不清内容，声音都动听，似花旗松林子里某种叫声特别脆亮的鸟。

我和怀里的婴儿一起对着雾气。她的世界依然混沌，可是她似乎注意到新奇的东西，头仰起，原来一只鸟从眼前飞过。眼睛朝下。原来人行道上的小女孩在发射肥皂泡，手拿着一杆枪，口里啪啪有声，大大小小圆溜溜的透明泡沫飞起来，成了一串气球。她对放在人行道旁边的黑色垃圾箱和绿色回收箱“啪”得格外起劲。妈妈跟在后面。

我怀里的孩子只在看，不会作出反应。我替她可惜，她长大以后，对于生命的黎明，都由于意识缺失而留白。如果能够清晰地记下第一次微笑，第一回笑出声来，第一次打滚，第一次坐稳，第一次叫妈妈爸爸，第一次学步；把妈妈哺乳时的爱抚，爸爸换尿片时的低语，把外公和外婆每天早晨可笑的暗里较劲——看谁抢先去把自己抱起来，那该多奇妙！司汤达说：“人的一生是由许多清晨组成的。”每个人的第一段人生，命定地由别人来记载。不管是哪位亲人，担任婴儿期的目击者和记录者，都是最为幸运的。我就是一个这样的证人。

肥皂泡飞起来了，点缀着鲜奶般的天空。

晨　窗

刘荒田（美国）

正如童年经验于作家而言是珍贵而伟大的馈赠，但凡经历过知青生活的作家，很难将这段经历从生活中抹去，更无法回避这段历史在作品中的表达。梁晓声、张抗抗、韩少功、叶辛、肖复兴……从“前知青文学”到“后知青文学”，知青题材仍然是取之不尽的资源，存在无限的叙事空间，作家们不断自我挑战、自我颠覆、自我再造，刷新不同时代对于知青生活的不同认识。

30年书写不尽的知青文学

自《西望茅草地》起，韩少功就在知青文学创作中成为领军人物，但他本人并不认同所谓“知青文学”的概念。“写知青有各种各样的角度，我的角度不可能取代他人的角度。而且‘知青’只是一个身份，一个载体，承载的是人性，与其他身份承载的内容没有太大区别，因此一般来说我从不用‘知青文学’这一类概念，就像我从不用‘工业文学’‘农村文学’‘改革文学’这些概念。”他觉得自己的新作《日夜书》就是一本叙事，一本读物，有兴趣的读者看看就好，不必管它可以划入哪一类。

无论如何，知青文学已成为约定俗成的名词。中国工人出版社知名编辑岳建一曾经主编《中国知青民间备忘文本》丛书，并在编选中提倡民间记忆。“因为民间记忆虽然有着贫寒的烙印，但是它具有质朴、尊严，民间记忆是一切历史的精魂，没有民间记忆的纪实文学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纪实文学。”知青文学呈现出纷繁复杂的多种面貌。多年来，知青文学一直不断地出版，层出不穷。

知青岁月是一代人的阵痛，总有人怀着复杂的心情回忆那些日子，总有人在反思人生时掉下热泪。可见，逝去的年代总还有值得珍惜的东西。20世纪80年代，知青文学的出版曾达到一个高峰。1987年，老鬼将8年的内蒙古草原生活融入了长篇小说《血色黄昏》。这部讲述北京知青在内蒙古的真实经历的小说，出版后先后加印7次，销量达40万册。《中国知青文学史》曾高度评价：“《血色黄昏》是一部批判现实主义作品，是知青文学的里程碑作品，它真实地反映了知青的精神世界，塑造了一系列知青的个性形象，不仅具有审美价值，而且具有历史学、社会学的研究价值，是知青运动几十年以来，最具历史价值的一部知青长篇小说……”作家肖复兴的《绝唱老三届》最初也是写于1987年，后连续3次再版。初版描写上山下乡运动中分赴全国各地的知青在乡村的生命、情感与命运，以及知青大返城初期的生活境遇，新版又补充了知青大返城后即1979年后这30余年的跌宕起伏新的生活际遇与命运。知青这一代所经历的“文革”、粉碎“四人帮”、改革开放这几个中国不同的重要历史时期的生活命运，在《绝唱老三届》中有了一个更清晰完整的勾勒。肖复兴表示，希望能够尽自己最大的努力，走进记忆的深处，也走进现实的前沿，不回避历史、现在和知青的内心，“为这一代人立传，写他们其实就是写我自己。”

凡是有知青的地方都会有许多悲怆感人的故事，在知青题材的宝库里一再挖掘的作家大有人在。作家叶辛在贵州当知青10年，将自己的经历写进了小说：《蹉跎岁月》写知青上山下乡中发生的故事，《孽债》写他们回到城里，《客过亭》写知青重返山乡找青春岁月，这差不多完成了一代人的命运书写。如今，“蹉跎岁月”4个字，也已成为人们对那个特定年代知青们遭遇的代名词，30年来，《蹉跎岁月》一印再印，已经有过十几个版本，印刷过几十个版次。直到现在，他脑中仍然有很多知青的故事。

知青文学的多样表达

作为引领知青文学的一面旗帜，作家梁晓声认为，自己作品中的温暖底色可能与自己的个人经历有关。“我是1966年老三届毕业的，经历‘文革’两年后下乡。我是带过红卫兵袖标的人，任何人都可以就此质问。德国电视台来采访，我说，红卫兵时期是那样式的，我不是那样式的。恰恰是‘文革’中，我和同学们的关系是好的。当看到老师被剃鬼头时，我给我的老师敬礼。因为一次敬礼，我的老师多年后仍打听我在哪里。我要感谢文学。我在‘文革’前看了那么多文学作品，文学艺术潜移默化的影响在我身上印证了，我接触了很多知识分子，我对所有受伤害的人表现出友善。没有一个同学或同事，站出来说：我来揭发我所认识的梁晓声。”梁晓声说，并不是说自己有多好，而是说好的文学非常重要。

在知青文学的写作队伍中，作家王松用一种极端化的方式表达知青的绝望，“冰冷”、“尖锐”成了他的标签，其作品犹如一面镜子，照出了人性的恶，让人读到了特殊年代中人与人之间或人与动物之间的暴力和冷酷。甚至有评论家说，王松写的知青小说是“恶之花”。他坦率地说，写作是灵魂深处的外泄。真正的好作家不应该在作品中欺骗别人和自己。关于作品中对人性恶的深刻揭露，王松说：“在我开始对生活有记忆的时候，我所受到的是不公正的待遇，感受到的温暖是很少的，这些决定了我对生活的看法。‘文革’中我父母被关在牛棚里，我是在受歧视的环境中长大，有一种极度的自卑，也使我永远站在生活之外，对任何事都做旁观者，使我本能地对生活有一种绝望。”不同的作家，认识是不一样的，这里有个体的差异。有的作家看待问题很达观，很宽容，他很羡慕，也很尊敬他们。但是他也相信，偏执也是一种作家性格。“用弗洛伊德的观点，童年时有这样的情结，受到这样的伤害，决定了我对问题的思考。我最典型的代表作品《红汞》、《双驴记》也是这样。每当写起这样的小说，我有一种快意，有一种淋漓尽致的酣畅的感觉。”

知青书写走向终结？

很多作家自上世纪80年代起对于知青文学的书写不曾中断。为何30年来对于知青文学情有独钟？今天的书写和当年有何差异？“《飞过蓝天》、《西望茅草地》同是写知青，但与《日夜书》一比，显然就不是一回事，可见记忆是有各种升级版本的。”作家韩少功在接受采访时说，一个人的少年时代是一张白纸，留下的痕迹较为清晰，对日后的影响可能很大。但日后的岁月是显影剂，是变焦的镜片，可以改写少年的记忆。所以仅有知青一段是不够的，即便是写知青，后来的经历和感受会决定你是这样写，而不是那样写。

韩少功在一系列小说文本中塑造了鲜明生动的知青群像。有知青上山下乡时理想与现实的悖离，也有知青回城后的多彩人生。30年后写作和过去的知青写作心态有何不同？韩少功说：“我的这些同辈人经历了‘文革’和改革，是中国几千年来社会变化最为剧烈的一段，构成了坎坷、震荡、裂变、悲欣交集的一个巨大总和。在国外与西方朋友们聊起来，他们从家庭到学校，从学校到机构，几十年的还贷和纳税，公式化的人生轨迹几乎千篇一律，我们随便说一两段往事，他们都会觉得惊讶不已。但这样一大片经验资源，需要一种精神上的沉淀、消化以及回应。我们到底做过了些什么？我们到底有哪些得和哪些失？如果与儿孙辈交谈起来，我们能提供哪一些人生教训？……这就是我写作中经常遇到的疑问。事情毕竟过去这么多年，我希望自己尽可能克服情绪化，多一些冷静求实。”

梁晓声曾以《今夜有暴风雪》等作品名扬天下。时隔30年，他再度提笔创作时仍有不同感受。“以前我只是写这一代人如何如何；后来我突然意识到，这一代人背后的时代更加可贵和重要。我写《返城年代》并不是为了怀旧，更重要的是回到历史的端点，展现一段真实的岁月，给现在的年轻人补上历史记忆。”梁晓声说。新作《返城年代》以现实题材为出发点，以知青们的返城生活为背景，塑造了以林超然、罗一凡等人为代表的知青群体，借由他们的故事，展示知青一代的返城生活及命运，人生思考及心路历程。

作家邓贤1994年创作了《中国知青梦》，2004年又创作了《中国知青终结》，而这部作品先期在《当代》发表，前所未有地引起刊物脱销加印。自此，拉开了知青反思读本的序幕。《中国知青终结》承接了邓贤对知青命运的一贯关注，不仅在题材上有了新的开掘，更在思想高度上有了新的提升，记录了一批跨越国境、支援世界革命的知青们的命运。他们是最后的知青，是知青运动的句号。他们轰轰烈烈而又凄凄惨惨的命运是一代知青的缩影。

历史不应该被遗忘，无论这是一段什么样的历史。邓贤说，他希望自己的“终结”不是结束而是开端，希望在看到“终结”之后，有源源不断的新的知青文学的诞生，有更多更深入的反思由此展开。尽管逝去的那段历史中有许多值得诅咒的东西，但邓贤的记录绝不是止步于诅咒，而是在客观的记录中蕴藏着冷峻的反思，是为了那段悲剧的历史永远不再重演。因此，关注《中国知青终结》的读者已不单是知青一代，不单是一代知青的后人，甚至也不单是一般意义上的文学读者。

肖复兴的《黑白记忆》、《北国记忆》，曾入选《中国知青文库》。他认为，知青文学也有重新升温的态势，“但我认为我们这一代作家已经到了应该与知青文学告别的时候了。”

电视剧《知青》剧照

《乒乓中国梦》：国球的感人篇章

张守仁

蔡振华与乒坛五虎将　孙亚利摄

每当读完一本鼓舞志气、提升情操的好书，内心总不能平静。李玲修、王鼎华合著的报告文学《乒乓中国梦》（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），就是这样一本励志的优秀读物。上世纪90年代初，蔡振华带领中国乒乓球队卧薪尝胆、刻苦训练、勇于创新、重登世界乒坛顶峰的事迹，深深感动了我。

老作家李玲修是个文艺界的多面手。她当过电影演员，任过编剧，做过文学编辑，写过报告文学、散文、中长篇小说，获奖无数。几十年来，她执著献身于体育题材的写作，硕果累累。玲修执笔的《乒乓中国梦》，在她众多体育题材作品中，其思想性、艺术性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、新的水平。书中一个个真实的故事，一个个精彩的细节，一句句深刻的话语，一次次挫折、悔恨、暗泣、狂喜的场面，一个个令人喉咙发紧、心跳加速、呼吸窒息的瞬间，浓墨重彩地绘就了中国乒乓健儿的群英图。

本书的核心人物是乒乓队的主教练、总教练蔡振华。乒乓球队曾有一段低落的时期。1991年6月21日，蔡振华在担任男队主教练就职演说中说：“在这样一种困难情况下，由我担任主教练，难度是显而易见的……我首先要做的就是恢复全队的信心……人总是需要点精神的。我们这个队以往就是凭着这种精神才经受住了常人难以承受的艰辛，换得了常人难以取得的战果。这种信心、信念和恢复和获得必须靠严格管理来实现。”蔡指导从严管理，狠抓纪律。从此队风大变，面貌一新，全队上紧弦，刻苦训练。训练馆里，你只听见球拍和小球相击的声音，只听见乒乓球落在球台上的弹跳声，只听见运动员围着球桌奔跑的脚步声。你只看见一道道白色闪电来回穿梭飞驰，只看见球台上、地板上到处是运动员洒下的一滴滴汗水，只看见球桌周围尽是汗水流成的一滩滩湿地。这时，银球已成为他们的心，他们的命，他们的魂。他们睁开眼睛是乒乓球，闭上眼睛是乒乓球，睡梦里还是乒乓球。他们的日常生活已和小球合二而一。他们在苦练中不断创造新的技术、新的打法，丰富了世界乒乓技术的宝库。经过如此苦练，终于在1995年天津举办的第43届世乒赛上，中国乒乓球队横扫千军如卷席，夺取了7个冠军，打了一场大快人心的翻身仗，举国欢庆，兴奋莫名。获得如此辉煌的战果，从蔡振华执教起，只不过用了4年左右的时间。

接着乒乓球队迎战1996年7月24日在亚特兰大开幕的第26届奥运会。奥运会前3个月，蔡指导旧病复发，突然腰部扭伤，被急送至北医三院动手术。动手术前，他躺在病房里，反复观看、钻研一盘盘录像资料，设计奥运会上的夺杯方案。动手术后，曲院长叮嘱他至少要卧床静养3个月。可蔡指导才卧床1个月就坚决要求出院，随队飞往气候和亚特兰大相似的扬州封闭训练基地。蔡振华说：“乒乓球就是我的命。养兵千日，用兵一时。现在就是国家要用我的关键时刻，作为一个男人，能不拼一把吗？只要中国乒乓球队能在奥运会上取得好成绩，我个人付出多大的代价也值得，即使瘫了也值！”到了扬州，蔡振华腰上扎着又宽又厚的硬板腰带，在训练场地稍稍多站一会儿就要承受巨大的痛苦。他只能躺在体育馆二层观众席第一排过道里的长条桌上、或躺在空中吊床里指挥刘国梁、孔令辉、王涛们练球！在这样一位乒坛铁帅面前，队员能不舍命苦练本领吗？蔡振华，他活出了杰出主教练的精彩，闪耀出了血性男儿的光彩。正如他的名字“振华”那样，显示出了报效祖国、振兴中华的风采！他实现了就职演说中“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”庄严诺言。“祖国，你的名字比我生命更重要。”这不仅是一句歌词，更是乒乓健儿们的激战前的誓词。

本书还形象地记录了蔡振华那个团队里人才辈出、群星闪耀的盛况，以及年轻的队员们成长过程中的曲折经历。像孔令辉、刘国梁、王涛、马文革、丁松、马琳、刘国正、王励勤、王皓、邓亚萍、乔红、王楠、张怡宁、郭跃等，他们苦练乒乓球的生涯，无不有着可歌可泣、悲欢交集、苦乐兼备的艰辛过程。

名将手下英雄多。英雄们筑起的乒乓长城巍然屹立于亚洲东方。半个世纪以来，乒乓球已成为国球。国球扬国威。它始终吸引着国人的目光，受到国人的关怀，丰富着国人的生活，承载着国人的荣誉和幸福。我们为拥有如此超一流的教练和球员、如此超一流的意志品质、如此超一流的乒乓技艺、如此超一流的顽强作风，为由如此众多“一流”汇合而成的乒乓精神而感到无限自豪。

神书

2013年度新浪中国好书榜颁奖

由新浪阅读编辑部、专家评委与广大网友共同参与的“2013年度新浪中国好书榜·年度十大好书”日前在京揭晓。入选十大好书的作品分别是《邓小平时代》、《艾丽丝·门罗作品集》、《北去来辞》、《古拉格》、《我是落花生的女儿》、《炸裂志》、《没有色彩的多崎作和他的巡礼之年》、《历代经济变革得失》、《深夜食堂》、《出梁庄记》。其中，既有艾丽丝·门罗这种诺奖大家的作品，也有世界知名作家村上春树的最新作品。《邓小平时代》、《古拉格》都以恢弘的篇章及深入浅出的文字记录了离我们并不遥远的历史；《我是落花生的女儿》、《出梁庄记》则从不同角度记录了普通人的生活，朴实、平民化。而林白的长篇小说《北去来辞》与阎连科的《炸裂志》也显现出作家旺盛的创作力与关注现实的情怀。此外根据网友投票，柴静的《看见》获得“年度最具人气图书”，而《平如美棠》以一对老人相濡以沫的故事获得“年度最感动图书”。

《好妈妈胜过好老师》创500万册销售奇迹

尹建莉所著的《好妈妈胜过好老师》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以来，5年时间已经连续印刷67次，销售已超过540万册。本书融专业性、操作性、文学性于一体，深入浅出，理论与实践结合，改写了同类书以经验性、说教性为主的枯燥、低端形象。本书前后获得了20多个奖项，被引进到台湾、越南、泰国、韩国等国家和地区出版发行。作家出版社日前成立了“尹建莉工作室”，为尹建莉图书的出版、打击盗版及影视剧的相关工作做好服务。